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6.020

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在英语世界的 建构与价值观念传播

——以《儒林外史》的传播为例

鄢宏福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文人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知识传承者和道德守护者的角色。中国文学中有大量由文人创作、刻画文人形象、表现文人生存状态和人生理想的“文人主题”作品。通过对《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在英语世界的建构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文人形象的建构是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抓手,对传播中国传统和主流价值观念具有示范意义。

关键词:《儒林外史》;传统文人;形象;建构;价值观念

中图分类号:I2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6-0141-07

在文化“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形象的建构成为宏大的时代命题。国家形象,是指“公众对一个国家的综合评判和总体印象”^①。国家形象的建构具有系统性、长期性、多维性等特征。当前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主要偏重宏观研究,对微观的个体形象关注还不够。实际上,“人的形象塑造是国家形象塑造的根本”,个体形象既是国家形象的构成和缩影,又是建构国家形象的载体^②。具体来看,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象对外传播,“对于塑造中国形象起着重要的作用”^③。因为大多数人往往是通过阅读作品来接受异国形象。中国文学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典型的形象、深刻的内涵,为中国形象的建构提供了生动的素材。进一步看,中国文学中有大量由文人创作、刻画文人形象、表现文人生存状态和人生理想的“文人主题”作品。通过这些作品的传播,中国文人形象走向世界,他们所代

表的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得到广泛传播。人类文化史上因而增添了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蒲松龄、曹雪芹、鲁迅等一大批响亮的中国名字。因此,中国文人主题作品的传播和中国传统文人形象的建构,对构建中国形象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研究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在英语世界的建构,能揭示中国形象建构的历史性、系统性和复杂性。本文所称的“英语世界”,不仅指英国、美国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而且包括以英语作为交流媒介的语言世界。考察中国文人形象在英语世界的建构过程,需要注意客观之“形”与主观之“象”的比较。这里所说的客观形象,指作品中刻画的人物形象,涉及人物的外表相貌、品行操守、理想追求等。这种客观形象要传播到英语世界并形成主观印象,在微观层面,涉及文学形象的传递;在宏观层面,还涉及对文学形象所蕴含的文化形象的认知与解读,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密不可分^④。

收稿日期:2019-05-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8YJC740121)

作者简介:鄢宏福(1983—),男,河南光山人,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①范红,胡钰:《论国家形象建设的概念、要素与维度》,《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4期。

②杨琳,许秦:《从个体形象到国家形象:基于微观视角的国家形象传播研究》,《国际传播》2018年第5期。

③姜智芹:《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与中国形象的变迁》,《当代外语研究》2019年第1期。

④陈惠:《略论中国文化形象在西方视野中的演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一 《儒林外史》:现实与理想中的中国传统文人形象

一般意义上,“文人”指的是“读书能文的人”^①,与“文人士”“知识分子”等概念通用。从学术的角度上看,“文人”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文人”源起于“士”,西周到春秋初,“文人”指“有文德的人”;东汉时,“文人”与“文士”等同,指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代表社会道义的知识阶层的成员^②。尔后,“文人”概念便基本固定下来。自古以来,文人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但是中国最特殊、最值得注意的阶层,而且也是整个国家盛衰治乱之关键”^③。

在中国众多文人主题作品中,《儒林外史》是重要的典型。该部长篇小说由吴敬梓(1701-1754)创作,系“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被奉为讽刺文学的杰作,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林外史》以中国明代社会为背景,刻画了封建文人的群体世相。全书跨越一百多年,描写了近200位人物,“士农工商、医卜僧道、流民胥役、妇女奴婢等无所不具”^④,但“机锋所向,尤在士林”^⑤。这部小说揭示了科举制度下中国文人的生存困境与道德堕落,也寄托了作者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从文学形象来看,在《儒林外史》中,作者用辛辣讽刺的笔触,生动地描摹了秀才、贡生、举人、翰林、斗方名士、八股选家、官吏乡绅等各个层面的士林人物,刻画了周进、范进、汤知县、严贡生、王举人、张乡绅、牛布衣、匡超人等一大批可怜、可憎的形象,以及王冕、杜少卿、沈琼枝、庄绍光、季遐年等可钦、可敬的典型。在文化形象方面,这些人物相互交织,构筑出明清文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文人生存的社会空间和文化土壤。这些人物具有其时代局限性,却又不乏历史真实性和群体代表性,因此,在传播到英语世界之后,成为英语世界中国文人形象的背景,亦成为中国形象的典型之一。

二 《儒林外史》英译中的传统文人形象流变

《儒林外史》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而且被翻译成英、法、德、西班牙、俄、日、韩等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本文仅关注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并考察这一过程中中国文人形象的建构。

对于《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学界已经进行了初步探索。张义宏简要梳理了《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史^⑥,周静分析了《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传播的推动因素^⑦。从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到《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基本轮廓:从文本的角度来看,《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有节译和全译,其中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中西合璧的译本《儒林》(*The Scholars*)仍是截至目前英语世界唯一的全译本。但上述两位学者认为最早的英译文是193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英文杂志》,对《儒林外史》进入英语世界的肇始尚有不少疏漏。笔者以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为基础,从中国文人形象的建构出发,对《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进行考察。

(一) 中国文人理想典型描画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儒林外史》最早的英译文出自国内。1925年,《英文杂志》(*The English Student*)刊登了韩邦昌翻译的《节录〈儒林外史〉记季遐年事》。紧接着,该刊1927年第1期和第6期又陆续刊登了他的《节录〈儒林外史〉记王冕事》和《〈儒林外史〉记荆元事》。《英文杂志》于1915年创刊,1927年停刊,是民国时期的一份英语学习杂志,也是商务印书馆创办的第一种英语学习杂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各类杂志中,《英文杂志》销量仅次于《东方杂志》。该月刊读者市场远及日本、南洋与欧美诸国,影响甚广。《英文杂志》辟有专门栏目,刊登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对于从《儒林外史》节录的三位人物季遐年、王冕和荆元的故事,分别取题“古怪天才”(CHI HSIA-NIEN, *THE ECCENTRIC GENIUS*)、“牛童画家”(THE STORY OF WANG MIEN, *THE COW-*

①夏征农,陈至立:《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2页。

②陈詠红:“文人”概念起源考释,《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③龚鹏程:《中国文人阶层史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④段江丽:《吴敬梓与儒林外史》,引自《汉英对照〈儒林外史〉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⑥张义宏:《〈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经典化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2月18日。

⑦周静:《〈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传播的推动因素研究》,《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2018年第二辑,第276—284页。

BOY PAINTER)和“裁缝诗人”(THE STORY OF CHING YUAN, THE TAILOR-POET)。在《儒林外史》塑造的众多人物中,季遐年、王冕和荆元都属于作者心中的理想人格。在他们身上,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文人的高尚品格和个性追求。季遐年是书法奇才,他不畏权势、不贪名利,追求自由、个性张扬,与英国20世纪著名作家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中刻画的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颇有几分相似。王冕出身贫苦、孝敬母亲,他自学绘画,不慕功名、嶙峋磊落。荆元则不以裁缝职业为贱,自得其乐,彰显了中国传统文人纯朴高卓的品性。总体来看,韩昌功选取的这三位中国文人,都来源于社会底层,虽出身平凡,但身上保留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古风遗存,是理想化的典型。

1935年,《英语周刊》(English Weekly)第134期刊登了郭功隽的《王冕的故事(节译儒林外史)》^①。内容与《英文杂志》上刊登的王冕故事相近,因此其传播的人物形象也十分相似。《英语周刊》创刊于1915年,1941年停刊。该刊出版之后,曾“风行海内,日、美、南洋各埠之学校、商界咸寄函订购”^②,因此在英语世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1940年,《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10-11月期刊登了徐诚斌译的《四位奇人》(Four Eccentrics, The Epilogue to Ju Lin Wai Shih),选自《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这四位奇人分别是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分别擅长书法、弈棋、绘画、弹琴。“琴棋书画”是“文人四友”,是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重要元素,是其文化修养的表现。译者在故事之前附上了前言,对《儒林外史》的时代背景、写作目的以及四位奇人的性格进行了分析,认为作者的用意是要表明“人生的真义不在于权力财富,而是要修身养性、净化灵魂”,这四位奇人皆属于“出身贫寒,但心灵丰富;权力卑微但富于同情,因此接近率真的本性”^③。

1946年,由美国知名作家高克毅(George Kao)编选、林语堂撰写导读的《中国智慧与幽默》(Chinese Wit and Humor)^④收录了王际真翻译的《儒林外史》第二回和第三回,题目拟为《两学士中举》(Two Scholars Who Passed the Examinations),讲

述了周进中进士、范进中举人的故事。这两个人物的故事相对独立和完整,从中可以看到科举制度下,文人饱受摧残,而一旦金榜题名,旋即飞黄腾达的境遇。这是中国文人受封建社会制度和礼教毒害的“变异”形象。王际真(1899-2001)是美籍华人学者、翻译家,译作包括《红楼梦》(节译)、《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集》《中国传统故事集》《现代中国小说选》等。王际真总体上保留了原文的风貌,删除了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语言简洁地道,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与他翻译《红楼梦》等作品的风格一脉相承,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

1965年,翟楚、翟文伯父子(Ch'u Chai and Winberg Chai)选编的《中国文学宝库》(A Treasu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收录了《儒林外史》第五十一回《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的部分译文。该书是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的入门图书,遴选的中国文学体裁包括散文、小说和戏剧。在经典小说部分,内容包含六部中国经典长篇小说,即“四大名著”加上《金瓶梅》和《儒林外史》。翟楚父子认为,这部小说的主题在于表现“中国文人对科举考试、权力与财富的态度”^⑤。有趣的是,他们在篇幅有限的中国文学选编中,选取了凤四老爹的故事。凤鸣岐身上,反映出中国文人少有的品格,他有勇有谋、行侠仗义,是典型的豪侠形象。由此可见,编者的选材视角十分独特。

1973年,由张心沧(H. C. Chang)编译、英国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剧》(Chinese Literature: Popular Fiction and Drama)收录了《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和第三十二回的译文。所选两回故事的主角杜少卿,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吴敬梓的真实写照。作者在他身上着墨颇多,他淡泊名利、尚义任侠,既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又彰显了鲜明的个性色彩。

《儒林外史》虽是长篇小说,但从结构上看,颇具短篇小说的特征,在相对独立的章节中,展示了不同的人物形象。从《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上述节译来看,尽管篇幅不长,但选材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呈现的主要是原作者理想中的中国文人形象,表明了对文人形象的心理期待,对中国文人形象的建构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①K.T., Kuo. "The Story of Wang Mien, The Bow Boy", *English Weekly*, 1935(134).

②转引自丁伟:《商务印书馆〈英语周刊〉办刊历史述考》,《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2期。

③Chen-ping, Hsu. "Four Eccentrics, The Epilogue to Ju Lin Wai Shih", *T'ien Hsia Monthly*, 1940(2).

④George, Kao: *Chinese Wit & Humor*. New York: Coward-McCann, INC, 1946.

⑤Ch'u Chai, Winberg Chai: *A Treasu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65, p.249.

(二) 中国文人现实群体呈现

中国典籍在国外的传播,一般遵循由点到面、由散到全^①的演变过程。如果说《儒林外史》上述节译本在英语世界展示并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典型形象,那么杨宪益、戴乃迭的全译本则更加全面地呈现了《儒林外史》中的文人群体形象。1957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杨、戴合译的《儒林外史》英文全译本,这是《儒林外史》唯一的英文全译本。

总体而言,在传达中国文人形象方面,这个版本具有以下特色:一是作为唯一的英文全译本,它全面地反映了作品的原貌,包括不同个体的生存环境和心理历程,从而立体地展现了传统文人形象;二是中西传播者合作的模式,既保证了传播内容的忠实性,又兼顾了受众的审美习惯,在文学形象跨文化转换递上找到了平衡;三是在传播效果上,得到了英语世界研究学者和普通读者的认可,为国家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提供了理据。

就传播主体而言,《儒林外史》采用的是中西合作的模式。杨宪益坦言,如果没有夫人的帮助,“我不会把它们翻译成那么好的英文”^②。杨宪益(1915—2009)和戴乃迭(1919—1999)是译界伉俪,夫妻二人译介的文学作品,“从先秦到现当代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中国翻译界无人企及”^③。他们将《诗经选》《离骚》《史记选》《唐代传奇选》《聊斋故事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红楼梦》《中国古代寓言选》《鲁迅选集》等中国文学精品译介到英语世界,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和中国文学形象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1952年,在外文出版社领导的邀请下,杨宪益以专家的身份到外文社工作,主持中国文学的英文翻译工作,系统介绍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杨宪益参与了这个项目的选题工作,其中,《儒林外史》是较早出版的一种。

在传递文学形象时,杨宪益、戴乃迭采用了比较忠实的策略。杨宪益认为:“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④在人物形象转换时,杨、戴基本上对原文亦步亦趋。对于人物的社会场景、服装打扮、言谈举止、心理活动都做了准确传达。对于“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这样地道的口语,甚至做了字对字的传递。当然,他们并不执着于一种

文化传播策略,虽总体上忠实于原文中的形象,但有时也会采用相对自由的方法,例如他们将“獐头鼠目”译作“homely”(相貌普通),但以简洁、地道闻名的译者王际真尝试保持原文中生动的人物形象,从字面来转换成“eyes of the musk deer and eyes of the rat”。以此观之,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无论传播者如何向目的语文化贴近,总是不可避免地要保留源语文化异质性的成分,从而建构出异域的文学形象。若以细节而论,英语世界的人物形象与源语文化中的人物形象并不总是保持对等,不同的传播者传递的形象也存在偏差。这些都是形象跨文化建构过程中经常发生的现象。

在传播效果方面,杨、戴二人的《儒林外史》英译本在外文出版社出版之后,被多次再版(1964,1966,1973)和重印,并被收入“大中华文库”(1999)。这里要着重指出,作为一种国家对外文化传播实践,文库不仅能够系统、准确地再现中华文化经典,而且能够扩大其在世界上的影响。而且,文库的“总序”“前言”又能为英语读者提供专业、详尽的参考。在《儒林外史》英文前,附有古典文学研究学者段江丽长达二十页的前言,对吴敬梓的生平事迹和《儒林外史》的文学地位、作品内容、人物、主题、影响进行了深入的介绍和分析,尤其是对作品中的文人进行了系统的归类 and 总结,对英语世界中国传统文人形象的建构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1972年杨、戴的版本被纽约格罗西特与邓拉普出版公司(Grosset and Dunlap)出版,后于1992年被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宝库》收录的《儒林外史》第五十一回中,翟楚父子基本沿用了杨、戴的译文,仅做了少量改动,但是并没有对此进行说明。从纽约出版社引进杨、戴的版本,到翟氏父子借鉴和引用他们的译文,足以证明杨、戴二人不仅准确地传达了源文的文学形象,而且在英语世界具有较高的可接受度。

(三) 中国文人形象的文化定位

《儒林外史》中中国文人形象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不仅依赖于文本再现与文学形象重塑,更依赖于文学史著述和文学研究的引导,以及对中国文人的文化形象定位。一方面,这些文学史和文

①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②杨宪益:《从〈离骚〉开始,翻译整个中国》,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页。

③辛红娟,马孝幸,吴迪龙:《杨宪益翻译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④杨宪益:《从〈离骚〉开始,翻译整个中国》,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学研究专著的作者是英语世界研究中国文化的专业力量,他们的观点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这些著述有不少被用作学校教材和工具书,因此影响的受众群体比较广泛。在地域方面,美国是《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传播的主要阵地。从研究的主体来看,美国的《儒林外史》研究经历了从移民到美国的华人学者为主到华人学者与本土学者并存的发展过程。移民华人学者主要包括王际真、柳无忌、张心沧、夏志清、孙康宜、黄卫总、商伟等,英语世界的本土学者则包括罗溥洛(Paul Ropp)、陆大伟(David Rolston)、白保罗(Frederick P. Brandauer)、柯伟妮(Whitney Crothers Dille)、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戴沙迪(Alexander des Forges)、科尔曼(John D. Coleman)等。^① 总体来看,英语世界对《儒林外史》中文人文化形象的研究,比较准确、客观,具有相当的深度。

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对《儒林外史》中的文人形象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儒林外史》可以算作“一部重要的反映文人士的小说”^②,当时的文人“既是国家的奴仆,又是高雅的学术传统的继承者,这种地位使他们面临着名声和财富的诱惑,也使他们更难于遵守德行”^③。这一论述,准确地把握了《儒林外史》文人形象的社会文化群体特征,揭示了中国文人的现实困境与内心挣扎。

由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主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对《儒林外史》中的文人进行了系统分析和分类:第二至第三十回中的文人,都是功名利禄的追随者。第三十一至三十七回,是小说的道德核心。文人学士理想人物杜少卿和他的朋友汇聚南京,试图重修泰伯祠,重振中国礼乐传统,但是这种努力无异于徒劳。第三十八至五十四回,作者意在表明,泰伯祭祀并没有收到效果。第五十五回的四位奇人,分别擅长琴、棋、书、画,象征着作者理想中的文人:他们是简单而正直的普通人,是腐朽社会中智慧与道德的代表。能从宏观的视角对众多人物进行上述总结和分析,足以表明英语世界的专业研究者对《儒林外史》中文人形象的

理解已经从文学层面上升到社会文化层面,研究得十分深刻,甚至达到了与中国国内研究者同样的高度。

由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Kang-I Sun)、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认为,《儒林外史》“展现了文人道德的沦丧、政府体制的窘境,以及儒家精英们重建道德秩序与文化权威的徒劳无功”^④。

2015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葛良彦的《士人与国家:中华帝国晚期作为政治话语的小说》(*The Scholar and the State: Fiction as Political Discourse in Late Imperial China*)。该书从社会政治背景出发,从与皇权的距离视角对《儒林外史》中的文人进行了分析,认为以小说最后一回四位奇人为代表的文人是新一代知识分子代表。

总体来看,英语世界对《儒林外史》中文人形象的传播与建构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儒林外史》的传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亦经历了从具体的文学形象传递到抽象的文化形象反思的深入过程,反映了文学传播与形象建构的长期性和渐进性。第二,传播和建构的主体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学者。他们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和文化修养,对中国国内的《儒林外史》研究成果有比较全面的掌握,因此研究的结论与中国国内的研究比较契合。这一特点,对于忠实传达中国文人形象,具有较好的引导作用。第三,传播和建构的形式相对多样,不仅包括节译、全译、文学史论著、学术论文,还包括《中国智慧与幽默》这样比较轻松的读物,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儒林外史》的传播空间。英语世界对于《儒林外史》的反复节译,既让我们看到了英语世界读者对于这部长篇小说的不同关注点,也让我们见证了中国古典文学走出去的灵活路径。

三 从文人形象建构走向价值观念传播

从前面的考察可以发现,英语世界的《儒林外史》传播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对作品的中国文人形象,包括文学形象和文化形象的定位和

①周静:《〈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传播的推动因素研究》,《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2018年第二辑,第279页。

②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③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

④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74页。

建构比较客观和准确。将视野从《儒林外史》拓展到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人形象的建构,在更广阔的层面上,离不开中国文人主题作品,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谱系的传播。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丰富了中国文人形象的内涵,反映了中国文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与理想追求。唐代以后,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个文人社会,文人阶层是社会的主导力量,文人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一类人,整个社会也呈现出一种文学崇拜的气氛”^①。中国文人的生活,在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展现。因此,这些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都是对中国文人形象的建构。

但是,英语世界的中国文人形象建构具有历史性和复杂性,并非所有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建构都像《儒林外史》一样客观和准确,有时在典型形象的选择方面显得比较随意,有时在重要作品上还存在误读。《好逑传》是第一部被译成外国文字并在外国出版的长篇小说,“在译本问世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被向往中国文化的西方文人奉为经典”^②。小说讲述的是秀才铁中玉和才女水冰心的爱情故事。铁中玉急公好义的形象较早地进入了英语世界读者的视线。在外国人眼里,这类作品“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的人生道德观,因此很早就把这些作品都介绍到国外去”^③。实际上,这部作品还称不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明清时期的多部重要经典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中,有大量中国文人角色形象,他们身上,较多地呈现了中国文人的精神面貌和道德观念。这些经典作品被反复译介到英语世界,以其全面、深刻、动人的叙事,动态地建构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形象。但是,这些作品在英语世界也存在比较普遍的误读现象。英语世界的中国文人形象建构史上,还存在选择不准、认识不清的情况,因此就需要本土传播者的积极参与和有效引导,需要国家层面的文化传播干预。

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建构,还应该加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关注。从一些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不仅能领略中国传统文人的影响和转型,而且能拓展和深化对中国传统文人的认识。《围城》是另一部以中国文人为中心的长篇小说,被视作“新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书写的对

象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等海外留学归来的学子,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回到中国后却沉沦堕落、困顿无为。小说对西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化的西方文明进行了精心审视。1979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英文译本,译者是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和茅国权(Nathan K. Mao),这个译本很快再版,还被收入企鹅现代经典文库,并得到英美学者的关注。在中国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传统文化地位逐渐回升的背景下,传统文人的影响业已渗透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亦有大量反映中国文人生活和思考的作品。因此,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建构不能脱离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和现当代作品的传播。

就本质而论,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在英语世界的建构过程,是中华民族传统和主流价值观念的建构过程。尽管文人主题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构建了生动丰富的文人形象,但是这些形象较多停留在个体人物的故事层面,还未形成明确的群体形象,思想深度上也有待挖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经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中国传统文人整体形象的树立提供了文化土壤。《四书》《五经》与诸子及其他文化经典著作的传播,为英语世界理解中国文人的入生理想和价值观念奠定了坚实基础。“士志于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体现的是中国文人的智慧、操守与担当,体现的是中国人珍惜自然、爱护国家、追求真理、珍视和平的价值体系。以《论语》为例,它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经典。内容涵盖治学、交友、为政、尽孝、婚姻、祭祀等方方面面,有关“仁”“义”“礼”“智”“信”等思想,奠定了中国历代文人的道德规范和行动纲领。1809年至今,《论语》的英文全译本和节译本已有五十余种,在英语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论语》中有关理想人格“君子”的品行,也在英语世界深入人心。讲述中国传统文人故事,传递他们身上展现的中国主流价值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增进中外相互理解,应对现实矛盾,推动共同进步。

①龚鹏程:《中国文人阶层史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页。

②谭渊:《〈好逑传〉早期西文译本初探》,《中国翻译》2005年第3期。

③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6页。

英语世界有关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综合研究,尤其是有关中国传统文人的专门研究,表明中国文人形象建构正走向系统和深入。1955年,在美留学的张仲礼在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中,从相对宏观的社会视角审视中国的绅士阶层。同类著作还包括张灏的《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1987)、杜维明的《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Way, Learning, and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onfucian Intellectual*, 1993)、史蒂文·罗迪的《文人身份及其在清代小说中的表现》(*Literati Identity and Its Fictional Represent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98)、葛良彦的《士人与国家:中华帝国晚期作为政治话语的小说》等。中外研究者面临的共同任务是,让学术研究取得深刻认识,走出学术圈,面向更广大的受众群体。总之,从零星接触到全面传播再到系统研究,英语世界的中国文人形象越来越丰富、立体、逼真,其所代表的中国社会主流价值也将不断深入人心。

结语

中国社会历来重“文”,文人不仅是历史的参

与者,更是历史的记录者和诠释者。“文人主题”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以及中国文人形象的建构,既是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接近了中国文化的内核,因此既具有现实价值,又具有典型意义。本文通过考察《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中国传统文人形象的建构发现:第一,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文人主题作品,是中国文人形象的载体。其多元的表现体裁、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的人物形象,是中国文学走出去和中国文人形象建构的前提和基础。它们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和典型的案例,是建构中国形象的抓手。第二,中国文人形象的建构,包含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整体传播。从古代、近现代直至当代,中国文人的 人生价值观念受国内外文化发展的影响和冲击,不断发生着革新。中国文人形象的建构,本质上是建构中国文人集体秉持的价值观念和中华民族之核心价值观。因而,中国文人形象的构建,既要有横亘历史的深度,又要有全面反映现实的广度,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在更广的层面上,中国形象的建构亦是如此。英语世界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具有悠久的历史,处于动态的建构之中。当前传播中国文化,建构新时期的中国形象,需要充分研究和把握中国形象的历史形态。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i in the World of English and Spread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A Survey of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Rulin Waishi*

YAN Hong-f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literati, as part of the society that carries on knowledge and supervises social morality, has always played a significant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literary works created by the literati that are about its life and ideals. This paper surveys the translation of *Rulin Waishi* and studies on it, and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imag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i in the world of English. As is found, it is very practical to construct the Chinese image through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literati, which could also promote the sprea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Key words: *Rulin Waishi*;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i; image; construction; values

(责任校对 莫秀珍)